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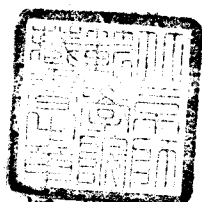
(美) 海伦·福斯特·斯诺 著

新华出版社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著

汪 溪
方 云 译
阎 绍 生



新华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6890

1083890

MY CHINA YEARS
A MEMOIR BY HELEN FOSTER SNOW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1984

根据纽约威廉·莫罗有限公司1984年版译出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汪溪 方云 阎绍玺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插页2张 241,000字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0册
统一书号：7203·145 定价：2.15元

02
11

作者的注

本书中的对话是基于记忆——直到最近以前，我的记忆力被认为是非凡的。许多则是我多少年前记录下来的。在我把尼姆·威尔士收藏品（尼姆·威尔士是我的笔名）送给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之前，我从三十年代的案卷中选取了六卷记录材料。已经判明，我的历史性的收藏中有关一些事件和形势的细节，即使对于中国人也是独一无二的材料来源。即便是没有旁的原因，我也高兴我拖带着这40箱材料，走了半个世界。

目 录

第一篇 上海

1931年到达上海·····	(1)
在沙利文谈命运·····	(6)
驻外记者·····	(25)
我的第一个战争·····	(34)
绝无仅有的地方·····	(41)
上海头脑·····	(51)
同斯诺结婚·····	(58)

第二篇 北京

1933年到北京·····	(72)
北京的四合院·····	(76)
北京的神秘·····	(82)
泰拉·德·查尔丹·····	(88)
女堂吉诃德·····	(96)
艺术、文学和革命·····	(102)
一年的终了·····	(113)
乡居在北京·····	(121)
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127)
黄海之滨的传教士·····	(134)
闹狐狸精的宅院·····	(141)
“一二·九”学生运动·····	(148)
行动·····	(157)

罗兹学者伯特伦	(170)
---------------	-------

斯诺访问“红星”	(173)
----------------	-------

插曲

1936年首赴西北	(183)
-----------------	-------

1936年10月斯诺归来	(194)
--------------------	-------

西安事变	(202)
------------	-------

低潮	(215)
----------	-------

新杂志《民主》问世	(220)
-----------------	-------

第三篇 延安

1937年延安之行	(230)
-----------------	-------

西安	(233)
----------	-------

密谋	(240)
----------	-------

惊险的潜逃	(247)
-------------	-------

抵达红军前线	(256)
--------------	-------

古城一屋	(259)
------------	-------

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	(263)
------------------	-------

延安四月	(273)
------------	-------

路上十日	(280)
------------	-------

西安重聚	(285)
------------	-------

第四篇 “工合”

告别北京	(294)
------------	-------

创建工业合作社	(295)
---------------	-------

香港	(305)
----------	-------

播种芥末籽的时期	(309)
----------------	-------

再会吧，亚洲	(320)
--------------	-------

结束语	(327)
-----------	-------

第一篇 上 海

1931年到达上海

“林肯总统”号客轮轻快地驶进浑浊的黄浦江的时候，甲板上有21个年轻的美国人急切地向前探着身子，要对上海码头——黄浦江岸边的城市轮廓投上第一瞥。男人们穿着浆过的白色热天衣服。一位来自安纳波利斯的海军上尉提着我的高尔夫球袋，一个献殷勤的弗吉尼亚人（很高傲的样子）帮我拿着网球拍子。

这是1931年8月，离开家已三个星期，有5065英里远。我打算最多呆一年。直到1940年12月我才离开亚洲，很高兴能在前一年逃脱了珍珠港事件。

船上的旅客没有一个是旅游者。有12个人要去马尼拉，他们都是陆军或海军人员，大多是结过婚的夫妇。有六个人同英美烟草公司订了合同，要去一个叫作埃尔希卢普的令人害怕的地方。我是同行者中的两个妇女之一。帕特·墨菲和我商定同住旅馆的一间公寓房子。她的丈夫是海军上尉，正在长江巡逻炮舰上执勤。

旅客中没有一个到过东方。我是唯一的中国“专家”。我不是读过了才出版的赛珍珠的《大地》吗？我正在研究E·T·威

廉斯写的《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在家里我曾读过一位中国通借给我的由J·B·鲍威尔的打印的报告,叙述他在1923年同包括美国妇女在内的二十几个人被土匪从蓝色快车上绑架的经历。我也曾把E·卡恩著的名为《中国货币》的巨著带上船,可是没有看懂。我在上海,除了主要的职业——美国总领事馆的办事员——之外,还有一项是向那个名称不大文雅的白银说客团^①写报告,说明用白银代替黄金作货币本位的好处。

1929年,随着华尔街的破产,金价突涨,银价贬值,美国采银业受到打击。由于有利的兑换率,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侨民,只要有很少的钱便可以生活得象贵族。我积蓄了担任白银说客团的先头部队——美国矿业公会——的助理秘书时挣得的大部分高薪,为了要到国外去旅行和写作。我通过了外事办事员的考试,又去寻找在海外的外交界职务,好让我的西班牙文、法文或意大利文能派上用场。我能够牵的线都是同白银有关系的。由于白银说客团的议员里德·斯穆特的好意,加上我父亲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友的帮助——有的曾是中国通,有的结识过一些中国通,例如当时的赫伯特·胡佛总统。就这样,我来到了白银的国度。

我排在第三位的职业也跟经济形势有点联系。美国的经济萧条正在恶化,西雅图的美国家邮路轮船公司因为没有旅游客人濒临破产。为了这个缘故,设在西雅图的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报业联合会聘我作通讯员——只限于写目的在于使已死去了的旅游,可以从“金色的灿烂的东方”得到复苏的文章。

当我们进入世界第五位繁华的港口时,我们的生活水平将提

^① 美国议院外有各种游说议员,为某一个目的聚集在议会外的大厅里,成为议会外的一种力量去影响议会。白银说客团即其一。——译者注

高许多倍。一美元兑换四到五块中国元，我们同上海的3808名美国人，全中国7000名上下的美国人，一起在世界各地方正被“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的时候，过着王子般的生活。我自信，也希望学习，不过，我终于不得不放弃要掌握货币的复杂性的想法。

（我从来也没有真正接受那种认为大萧条主要是由于金本位造成的观点）。

外国占有的上海码头再也不会象1932年日本攻打中国地界以前全盛的五个月那样繁荣了。码头上最高的建筑刚由英国籍阿拉伯人沙逊完工。这个公司正向上海转移资本。这个建筑就是华懋饭店。富有的大商业的大板们①在这里租了套间，互相设宴，为要找到旅游生意而奔波乞求。

黄浦港正在兴旺时期，海军舰只和商船高傲地在象蝙蝠翅膀的帆船和摇摇晃晃的舢板之间停泊。英国国旗代表着主要势力，日本和美国的旗子在酝酿着狂热的平静中下降致敬。“林肯总统”号经过港口的时候，我们向每只船招手致意。连顽强的、爱干净的日本人也向我们招手，可是他们似乎总是留一只手以便在甲板上晾衣服。

泊位和货仓延伸几英里，几乎所有的货物都由人工搬运，搬运工都是中国人，不允许外国人从他们手中抢活儿干，除非是少数几种非竞争性和非人工劳动的活。（没有一个传教士从任何中国人手里拿走一个铜板，所有教会的薪金和开支都从本国国内支付，不然，就不准许他们呆在中国。）水域被帮会控制着，没有人敢忽视它们，连日本人也不敢。

十九世纪前半叶，美国主要是通过建于1818年的康涅狄格的

① 旧时代洋行的经理。——译者注

罗素公司主宰着东方的贸易。上海码头的货仓那一带有一大片用古老的红砖盖的货栈依然立在那里，象个城堡。还有更古老些的美国传统：到中国来的第一条美国船是在1784年乔治·华盛顿生日那天开出的。

在“林肯总统”号上，我们觉得自己是这个古老的传统的一部分。我站在船头上，对于未来，象快速帆船上的雕饰似的，焕发着健康和雄心。来到中国对于我是极重要的事。我要不浪费每分钟去完成最多的事。我的脚已经踏上了船舷的栏杆，准备跨上中国的土地，只等着小船开到防波堤来。

虽然有人提醒我们，为了“面子”，外国人应该坐头等舱，我们为它付了500美元船票。但是我们按照美国传统，不去住昂贵的华懋饭店，而住了古老的礼查饭店。它是由美国一艘快船的船长和木匠们建造起来的，一度是东方最漂亮的旅馆。我说服了我们一行人，一块儿去登记。

我怎么了解礼查饭店的呢？它是一代新闻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提供的密勒—鲍威尔—斯诺体系的席位所在地。我带着我父亲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友给东方的报纸工作人员的主任托马斯·密勒的介绍信。密勒1900年到东方来为《纽约先驱报》报道义和团运动，以后就住下来了。也有信给他的门生J·B·鲍威尔。他在1917年就被密勒派去帮助创办远东最有影响的美国报纸——《密勒氏评论报》。（我立即被这家报馆聘请写书评——我的第四个职业，以后又当了它的驻北京记者，）

我没有带信给他们的门生埃德加·斯诺。他在1928年到了礼查饭店，22岁的时候成了助理编辑。不过，我有一个标着他的名字的卷宗，里面都是他的文章，包括我从《纽约先驱论坛报杂志》上剪下来的。我曾经接受了一个任务，从这家报纸上剪辑有

用的材料提供给美国矿业公会。坐在办公桌前，准备好了剪刀的时候，我曾想过：为什么我不能旅行，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我甚至想象过（多么错误啊）女性报纸发行人奥格登·里德太太和女编辑威廉·布朗·梅洛尼可能喜欢一个女人的文章胜过埃德加·斯诺的文章。

从我们登岸的地方到礼查饭店很近，可以步行，可是我们还是坐了洋车。我们满以为被一群暴徒袭击了——后来才明白原来是洋车夫在争生意——之后，我们得穿过拥挤成堆、肮脏不堪、衣衫褴褛、有着各种疾病的乞丐。迎接我们的美国邮路轮船公司的代理人站在他的洋车上向我们打手势：“现在中国没有人敢伤害外国人，”他嚷着：“看上去似乎危险，别管他们。”

二十来辆洋车停在礼查饭店前面狭窄的街道两旁。我们下了车，象所有新来的人一样，付了有点象赎身钱似的小费，我们为终于到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感到高兴。我们正停在黄浦江拐弯的地方。礼查饭店对面的岸上有一座巨大的，城堡似的，带有宫殿窗框装饰的旧建筑。当车夫打开车门让我下车时，那儿的荒凉、空荡使我有点颤抖。

“这是什么见鬼的地方啊？”我问。

“旧沙皇的领事馆”，人们告诉我，“三年前这儿发生过小小的枪击事件”。苏联领事把他的人员用路障关在里面，150个穿着沙皇制服的哥萨克军官去外面要攻占这座建筑。他们想在上海成立流亡者的政府。警察没有干涉。苏联人从门里开枪，哥萨克人就跑掉了。这可能是内战的最后一幕了。1927年在广州，苏联领事人员中有被国民党中国人杀死的。当然，外交关系中断了。

（我离开上海30多年之后，在1973年再来时，我发现美国和苏联的房子都显得更陈旧了。旅社用来接待华侨了，领事馆用木板堵

了起来。两国在上海都没有领事馆，而苏联在中国的东北边界上陈兵百万。）

在礼查饭店的大厅里，我们没有等候就登记完了。每人有一个穿着白上衣、满脸堆着奉承的笑容的侍者作向导，带我们进入房间。他们在走廊里值班，对我们最微小的需求也不怠慢。

从码头到旅社简短的洋车旅行，已经把我们普通人升格成了达官贵人。在一个苦力价格低廉的异乡，我们的额头上印有美元的标记。

我清楚地记得发现了这个通商口岸的奥妙的那个时刻。我站在那间又高又大的屋子当中（每天两美元，包括伙食）一顶灰色发霉的蚊帐满满地罩着一张维多利亚式的有四根栏杆的大床，屋子散发着发霉的气味。我用力拉开了几个很沉的红木或柚木柜子的抽屉，它们都镶衬着樟木或檀香木，有的是用肉桂木。抽屉的香味同空气的潮湿味混在一起。什么时候碰上这种香味儿，总勾起我对东方的怀念。我的一些旧资料和手稿，仍然保留着在樟木箱子里存放过的香味。

当我读《安娜和暹罗国王》的时候，我流下了思乡泪，把檀香燃了起来。安娜·利奥诺文斯早我50年到东方来找职业，如今，我依然能理解她喜剧性的遭遇和她对东方文化的惊愕。当我点燃着檀香写这本书的时候，似乎难以置信，又一个50年过去了。对于23岁天真的美国姑娘似乎是那末重要的礼查饭店房间里的种种，好象已经转换为一幕幕的音乐喜剧了。

在沙利文谈命运

我们太兴奋太急于想看看这个城市，顾不上打开行李了。我

简直等不及要望一望答应给我一个挣高薪职业的美国总领事馆。那将是我的主要职业——我明白，其他的项目都挣不到什么钱。墨菲海军上尉、他的妻子和其他到上海来的一共九个人，陪我乘洋车去登记。

我们似乎没感到那难以忍受的炎热，旅社老板说可能到104°F，那也是常有的。我们也没注意远处的南方将有台风袭来，我们正处在暴风雨前的低气压。中国通们在中午的骄阳下是不出门的，连疯狗或英国人也不出来。午饭后他们有长时间的午睡。

我们停在外白渡桥上观望苏州河，它离礼查饭店一带这个上海的特殊角落只有几码远。桥的那一边，统治着码头的是英国总领事馆，英国国旗在帝国主义的旗杆上凋零了。洋车夫沿着码头慢慢地走着，我眺望远处的港口，想起那些坐在长凳上的大班和巨商们，他们注视着驶进港来的轮船上的高耸的帆。

我是有点遗憾，古老的有着那蔷薇攀缘的红砖墙的美国领事馆不在码头上。码头被英国垄断着，虽然它不过是弹丸之地。我们排着队在护照柜台上登记的时候，看到有裂缝的地板已经下陷了。

我问瘦高个儿挺友好的副领事，埃德加·斯诺是否在上海，他答复说，刚从印度回来。“你想见他吗？”

“有这个想法，”我答道，有点警惕。

“我给他打电话。”

电话里的对话是一点也不保密的。大家被这一高声的对话逗乐了。在领事馆这边，说的大致是这样的：

“你是斯诺吗？这里有一位福斯特小姐要见你。今天才从西雅图来的。……胖？是，胖，50岁上下，保养得很好……阔气？金刚钻滴里嘟噜的。她有保镖……带武器？是，每个人都有两件

……斯诺，我要是你就不管她。我替你照看她……好吧，让我来给你介绍……让我问一下。”

他把手挡着受话器，用戏台上常用的细声说，“他请我们到沙利文去喝茶——马上。就在附近。”

“可以。”我的第一天不能比这再兴奋了。

同来的这帮人很有趣味，齐声说要跟我们一起去。“她不能没有保镖的，带那末多金刚钻，”一个男青年说。

我庄重地对他们说，“是一次采访——公事，我为斯科里普斯一坎菲尔德作的第一次访问。”

副领事解释说沙利文是上海唯一有冰激凌的地方。“不过，福斯特小姐，你第一需要的是私人包车夫。领事馆的头号听差担保他可以当你的保镖，全天服务，每月大约五块钱。你要不要？”

那时候中国沿海流行洋泾浜英语，新来中国的人也喜欢它。

“要的，”我同意了。

端庄的灰头发的头号听差领来一个将近40岁的车夫。这个人一副诚实的、风吹雨打过的面孔，笑容可掬。他的黑色洋车锃新发亮，还带着白色绣花靠垫。

“小姐，喜欢的，不喜欢的？”头号听差向我行官礼，一鞠躬。

“喜欢的，”我爬上洋车——直到一年半以后我离开上海一直用这辆车。

在崭新的、现代的、美国式的沙利文，我们围坐在一张小桌子边。墨菲夫妇在讨厌的湿热中显得无精打采。

“斯诺老是迟到，”副领事一边扇着我的通红的脸一边说。他介绍说，斯诺在印度旅行，因为热带气候生了病，回上海来治

疗，来写书。斯诺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从不着忙。他说，斯诺写了一篇批评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的文章，谁也不喜欢他。他想了一想后又说，“他还没有结婚……我也没有，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

我没理睬他。

“他来啦！”我的向导站了起来，伸出手来等待握手。

我抬头见到一个消瘦的、长得匀称的，穿白上衣的人。埃德加·斯诺脸色苍白、雀斑都显了出来。我希望他没有注意我失望的情绪——在我脑子里他的形象是勇敢、强壮、健康的世界旅行家。我看不惯面带病容的人，而习惯于运动员风度的人，我自己也多少是个体育爱好者。难道在东方做一个真正的旅行家一定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没关系，他挺英俊，挺吸引人，我想定了，努力排除那没有价值的第一印象。他棕色的头发曲髻着，漂亮的长睫毛下有着和蔼可亲的棕色眼睛，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有时似乎是蒙上了雾。后来我觉得他长得象劳伦斯·奥利维尔。我怎么样才能让他脱掉那件不象样的衣服，换上一套有垫肩的花呢衣服？我在琢磨着，忘记了104°F的高温。我看出来了，他的自我意识是坚实的。他的男性自我意识也是健全的，这并不依靠衣服的裁剪，也不依靠给人一个好的第一印象。我喜欢他的这一点。我自己总是希望给人好的印象，希望漂亮，希望让旁人喜欢，他却比我成熟。

没关系，他看到我，似乎第一瞥就被我吸引住了，我毫不遗憾。他向我走过来的时候，眼睛盯住我的脸，不止一次地被椅子脚绊住。

“敢问是利文斯通博士吧，”我咯咯地笑着问他。他拖把椅子坐了下来。他没大注意旁人的介绍，常常逼视着我的眼睛。

“斯坦利小姐，不，我的意思是美国小姐，从我1927年离开堪萨斯城以来，还没见到过……”他有着不寻常的讨人喜欢的男子汉声音。“你让我想起了我邻居家的姑娘。我已经忘记了象你这样的那个姑娘长得什么样子了。我没见到什么金刚钻，什么50岁肥胖的阔太太。”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青年人之间的传情总是彼此打趣，这是一种大学的幽默，中国式的猜谜游戏。象中国人似的，我们从来不揭开外表，总是调皮地让对方摸不透。什么都可以说，只要是什么也没有说。没有结论，可以证明某一点正确，只要是那一点什么也不是。埃德加和我老是用这种富有幽默的、互相挑逗的、轻乒乓球的方式谈话，即使在最沉闷的日子里也是这样。中国人喜欢这样。他们被训练得很会躲在平静的表面的后面，机智地回击。我打赌，在沙利文这样的对话至少出现过一次：“给我一份草莓冰激凌汽水，不带草莓的，”我对茶房说。

他一鞠躬，走到屋角去跟同伴们商量了一阵，回转来，满脸无可奈何的样子用洋泾浜英语说：“小姐，草莓没有的。你只能要没有巧克力的啦！”

美国方式是从重复中取得幽默。这是一种新发明，由J·P·麦克沃伊和奥格登·纳什总其成。我们之间的幽默还可以追溯到马克·吐温，提出某种意见，运用它的对立面把它衬托得更尖锐些。

“我不喜欢金刚钻，”我伸出光秃秃的第四指。我告诉埃德我差不多读过了所有他发表过的东西，我要求他接受我为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的第一次采访。“他们除了用金色的、光辉灿烂的东方去刺激旅游业复活的东西以外，什么都不要——理查德·哈利伯顿型的旅游业。你在泰姬陵游泳了吗？”

他说我要进行的采访有点晚了——他离开哈利伯顿的时代已经有一阵子了。他一到泰姬陵就得了痢疾，后来到了施维达根塔，染上了疟疾，病得要死。

“这可是我第一次执行新闻工作任务，”我叹了口气，“你能再当一次哈利伯顿让我采访一次吗？我原本以为有被叫做‘东方的呼唤’的什么东西的。”

“我来这里以前也有人这样跟我说过，”他说，“东方的呼唤就是‘茶房，茶房，帮我洗澡’，‘茶房给我脱鞋’，‘茶房，替我扳小指头，大多数的‘茶房’^①头发已经灰白了。”

我仍然坚持。他必然发现过一些奇妙的东西。

是的，他是发现了：一个小个子男人腰里围着土白布在摇纺车。他跟我谈甘地，谈到他的“最丑陋但最机智”的信徒，印度反妇女深闺制度的主要女性，撒若吉尼·奈都。还有尼赫鲁。他说，“在白种人老爷的白领带和白围腰布之间进行选择，我挑选甘地。”

埃德很自然、随便、容易相处，显然受过良好的教养，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有一种特殊的自信，不装模作样，不怕表示自己的意见。这些我都很喜欢。不过，哦，我真希望他穿的不是这末一件似乎是甘地的裁缝做的衣服。

我推开冰激凌汽水，把公文包放在腿上。我们两人忘记了汽水，其他的人一盘又一盘地吃着。

我把我的斯诺卷宗递给他，告诉他我为美国矿业公会做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收剪关于中国和白银的文章，我把所有能找见的有关他的文章都剪下来了。

① 英文的“茶房”同“孩子”是同一个字。——译者注